

李学勤 主编

中国学术史



(下)【三国两晋南北朝卷】

王志平 /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中国学术史

李学勤 主编

三国两晋
南北朝卷
(下)

王志平 /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中国学术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卷/李学勤主编;王志平
著.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9

ISBN 7-5392-3490-3

I.中... II.①李...②王... III.学术思想-思想史
-中国-三国时代;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晋代;学术
思想-思想史-中国-南北朝时代 IV.C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4580 号

中国学术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卷

李学勤主编 王志平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URL:[http:// www.jxeph.com](http://www.jxeph.com)

E-mail:jxeph@public.nc.jx.cn

(南昌市老贡院 8 号 330003)

江西科佳图书印装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787 毫米×1092 毫米 大 32 开本 50 印张 653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250 册

ISBN 7-5392-3490-3/K·42 定价:上、下卷 98.00 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第八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小学

第一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小学概况

一 汉末、三国时期的文字使用概述

汉律曾经规定：“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①但到东汉时，“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逮其说久矣”^②。杜台卿《玉烛宝典》卷一引崔寔《四民月令》云：“（正月）命幼童入小学，学书篇章。”注：“谓六甲、九九、《急就》、《三苍》。”魏晋虽未于文字有所规定，但《北史》卷八十三《文苑传序》云：“当途受命，尤好虫篆。金行勃兴，无替前烈。”然卫恒《四体书势》叙篆书云：“韦诞师（邯郸）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诞为武都太守，以能书留补侍中。魏氏宝器铭题，皆诞书也。”^③而刘宋时羊欣《古来能书人名》言钟繇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④铭石之书殆指篆书之类，章程书、传秘书恐指隶书之类，行狎书才是指行书一类。而据汉制，其正规之简牍犹用篆书，其一般者才用

① 许慎：《说文解字叙》引《尉律》。《汉书》卷三十《艺文志》文字与此略同。

② 许慎：《说文解字叙》。

③ 《晋书》卷三十六《卫恒传》。

④ 参见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一，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年，第11页。

隶草。^①从出土的简牍来看,其中有不少《苍颉篇》、《急就篇》残简,可以窥见当时学僮之书。

三国时期的政府没有对文字作过规定,但是吴主孙休曾经有过一个与文字有关的诏令:

人之有名,以相纪别,长为作字,惮其名耳。礼,名子欲令难犯易避,五十称伯仲,古或一字。今人竞作好名好字,又令相配,所行不副,此譬字伯明者也,孤尝哂之。或师友父兄所作,或自己为;师友尚可,父兄犹非,自为最不谦。孤今为四男作名字:太子名覃,覃音如湖水湾澳之湾,字茵,茵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霁,霁音如兕觥之觥,字羿,羿音如《玄·破首》之破;次子名距,距音如草莽之莽,字显,显音如举物之举;次子名尅,尅音如褒衣下宽大之褒,字焚,焚音如有所拥持之拥。此都不与世所用者同,故钞旧文会合作之。夫书八体损益,因事而

① 汉代策书以重要性不同,字体亦有差别。“策书者,编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以命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赐策,而以隶书,用尺一木,两行,惟此为异也。”此可见《后汉书》卷一上《光武纪》注引《汉制度》,《独断》与此略同;而日常应用简牍则作“草书尺牍”,见于《后汉书》卷十四《北海靖王兴传》。后汉赵壹《非草书》云:“龀齿以上,苟任涉学,皆废《仓颉》、《史籀》,竞以杜、崔为楷,私书相与,犹谓就书,云适迫遽,故不及草。”(参见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一,第2页)可见当时学僮之学书已尽效草书,或如皇象书《急就章》之体。而直到隋代,哀策之文还用篆书。《隋书》卷八《礼仪志三》云:“且哀策篆书,藏于玄宫。”《晋书》卷五十一《束皙传》云:“有人于嵩高山下得竹简一枚,上两行科斗书。传以相示,莫有知者。(张华)以问(束)皙,皙曰:‘此汉明帝显节陵中策文也。’检验果然。”此为传说以神乎其技。汉代哀策未用古文者,仅用篆书。王国维《科斗文字说》以科斗文为篆文,亦不确。

生，今造此名字，既不相配，又字但一，庶易弃避，其普告天下，使咸闻知。^①

本来君王使名字难犯易讳而改名，昭告天下亦颇有之。如汉宣帝刘询，本名刘病已，为使臣下难知易讳，于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五月下诏特为改名师。^②但特为造字者则殊不多见。故裴松之评曰：“休欲令难犯，何患无名，而乃造无况之字，制不典之音，违明诰于前修，垂嗤笑于后代，不亦异乎！”^③所言极为有理。

二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文字混乱状况

造字在江东也是有传统的，著名的即山阴朱育。《三国志》卷五十七《吴志·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云：“孙亮时有山阴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达，依体象类，造作异字千名以上。”《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著录“《异字》二卷，朱育撰，……亡”。而郭忠恕《汗简》引用书目中有朱育《集奇字》，或称《集古字》、《字略》。而董道《广川书跋》则引作“朱鮪《集字》”。《七录》还著录朱育《幼学篇》二卷。《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同。而《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志上》作“朱嗣卿《初学篇》一卷”，“嗣卿”盖朱育之字。“育”与“嗣卿”名字相关。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以为《抱朴子外篇》卷二十六《讥惑》所言“吴之善书则有皇象、刘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绝手”之朱季平即朱育，^④恐非。此风一直绵延后世。《经典释文序录》云：“《尚书》之字本为隶古，既是隶写古文，则不全为古字，今宋、齐旧本及徐、李等《音》所

① 《三国志》卷四十八《吴书·孙休传》注引《吴录》。

② 参见《汉书》卷八《宣帝纪》。

③ 《三国志》卷四十八《吴书·孙休传》裴松之注。

④ 参见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352页。

有古字盖亦无几;穿凿之徒务欲立异,依傍字部,改变经文,疑惑后生,不可承用。”此言“依傍字部”,当为离合偏旁;“改变经文”,殆如滥用假借。如今人所谓甲骨、金文书法篆刻相似。离合字形,谬称假借,甚至由于受到错误释文的影响,以误为正。我们认为这种“穿凿之徒”的本子就是这样一种类古文或称拟古文。有学者以为这种拟古文本是一种隶古定本,实未明《释文》语义。依陆德明之说,此本显然“全为古字”,又怎么会是隶古文呢?此外,再加上书体的差别,如真、草、隶、篆等,更易滋生疑惑。梁庾元威《论书》云:“晚途别法,贪省爱异,浓头纤尾,断腰顿足,‘一’、‘八’相似,‘十’、‘小’难分,屈‘等’如‘匀’,变‘前’为‘草’,咸言祖述王、萧,无妨日有讹谬。‘星’不从‘生’,‘籍’不从‘未’。许慎门徒,居然喁喁,卫恒子弟,宁不伤嗟?诳误众家,岂宜改习!”^①《颜氏家训·杂艺》云:

晋、宋以来,多能书者。故其时俗,递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观。不无俗字,非为大损。至梁天监之间,斯风未变。大同之末,讹替滋生。萧子云改易字体,邵陵王颇行伪字(前上为草、能旁作长之类是也)。朝野翕然,以为楷式。……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猥拙甚于江南。乃以百念为忧,言反为变,不能为罢,追来为归,更生为苏,先人为老。如此非一,遍满经传。^②

北朝亦颇多造字之人。北魏江式《上〈古今文字〉表》云:“皇魏承百王之季,绍五运之绪。世易风移,文字改变,篆形谬错,隶体失真。俗学鄙习,复加虚巧。谈辨之士,又以意

① 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第45页。

② 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并云:“吾昔初看《说文》,蚩薄世字。从正则惧人不识,随俗则意嫌其非,略是不得下笔也。”

说,炫惑于时,难以厘改。……乃曰追来为归,巧言为辩,小兔为觥,神虫为蚕。如斯甚众,皆不合孔氏古书、史籀《大篆》、许氏《说文》、石经三字也。”^①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云:“自有讹谬,过成鄙俗,‘亂’旁为‘舌’,‘揖’下无‘耳’,‘鼃’、‘鼃’从‘龜’,‘奮’、‘奪’从‘藿’,‘席’中加‘帶’,‘惡’上安‘西’,‘鼓’外设‘皮’,‘鑿’头生‘毀’,‘離’则配‘禹’,‘壑’乃施‘豁’,‘巫’混‘經’旁,‘皋’分‘澤’片,‘獵’化为‘獺’,‘寵’变为‘寵’,‘業’左益‘片’,‘靈’底著‘器’,‘率’字自有‘律’音,强改为别;‘单’字自有‘善’音,辄析成异。如此之类,不可不治。”

由于这种文字使用的混乱情况,历代统治者都想进行正文字的工作。可惜这种“书同文”的儒家理想由于南北朝的战乱格局而被延误了。但尽管如此,统治者还尽量进行了文字的规范整理工作。梁顾野王《〈玉篇〉序》云:

五典三坟,竞开异义。六书八体,今古殊形。或字各而训同,或文均而释异。百家所谈,差互不少,字书卷轴,舛错尤多。难用寻求,易生疑惑。猥承明命,预纆过庭。总会众篇,校讎群籍。以成一家之制,文字之训备矣。

据顾野王之《序》,则其撰《玉篇》实奉敕继父顾烜之业而已。至于北朝,《周书》卷四十七《赵文深传》云:“太祖以隶书纒缪,命文深与黎季明、沈遐等,依《说文》及《字林》刊定六体,成一万余言行于世。”

第二节 三国时期的小学

^① 《魏书》卷九十一《江式传》。

一 《字诂》与《广雅》

如果仅仅拘守《说文》的九千三百五十三个字,丝毫不顾及新词新义的产生,那么《说文》的九千多字就不能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社会发展也需要一定数量的更趋简易的俗字,所以既要重视古字,又要重视今字。重俗字的著作始于汉末服虔《通俗文》。此风气一开,对于字学的研究范围也便更广阔了。至魏张揖作《古今字诂》时,颇注意古今字形义之演变。《太平御览》卷六百五引王隐《晋书》云:“魏太和六年,博士河间张揖上《古今字诂》。其《巾部》:‘帅,今[纸]也,其字从巾。古之素帛,依旧长短,随事截绢,枚数重沓,即名幡纸。字从系,此形声也。后和帝元兴中,中常侍蔡伦以故布捣割造纸,故字从巾。是其声虽同,系、巾为殊,不得言古纸为今纸。’”此外张揖还撰有应用性质的《难字》一卷、《错误字》一卷,并见于《七录》。陈鱣曾辑张揖《字诂》为一卷,其《叙录》云:

(《颜氏家训·勉学》)又引云:“劔,支旁作刀剑之刀,亦是劔字。”按《说文》:“劔,曲刀也,从刀奇声。”无从支者。则劔为俗体。……(《一切经·正法念经音义》)又引云:“诂,今作识。”按《说文》有“识”无“诂”,则“诂”为俗体。安得谓“诂,今作识”字?

透过此读者已不难明白《古今字诂》之宗旨了。《魏书》卷九十一《江式传》载江式《上〈古今文字〉表》云:“然其《字诂》,方之许篇,或得或失。”其所谓“失”殆即指多引俗字。

张揖著作除此之外,尚有《埤苍》二卷,陈鱣有辑本。其《叙录》云:

《三仓》文字具在说文,此所谓埤益,盖杂取汉魏间俗字,方之许书,或得或失。如“苾为大香”、

“諄为告晓”之属，“瞽为明察”、“髀为尻骨”之类，皆与《说文》合。又如“谵，多言也。”“揀，择也。”按《说文》作“詹，多言也。从言从八从殳。”“束，分别简之也。从束从八。八，分别也。”此詹旁加言，束旁加手，实为赘矣。至其说有可以互证经典者也。如“箱，序也。字或作廂。”按《说文》有箱无廂。《急就篇》云“东箱”，《觐礼》云“俟于东箱”，《汉书·周昌传》云：“吕后侧耳于东箱”，得此“序也”一训，然后知今本《尔雅》之作“东西廂”为后人误改或体字也。

陈鱣一以《说文》为正，全无古今文字分化之概念，固不足道。然谓《埤苍》是取俗字，则殊为正确。正俗之别，因时而宜。古目为俗，今视为正，屡见不鲜。《说文》家抱残守缺，不移跬步，固视此等俗字弃如敝屣。

然张揖最著名之著作为《广雅》。《广雅》地位过去不高，但有了王念孙这位大学问家替此书作了《疏证》，犹如广告之名人效应，顿时身价倍增，声誉鹊起。但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却仍遗憾以王念孙之才力，本当为《尔雅》作《疏证》呢，则《广雅》之地位可见一斑。

张揖《上〈广雅〉表》云：

博士臣揖言：臣闻昔在周公，纘述唐虞，宗翼文武，克定四海，勤相成王。践阼理政，日昃不食。坐而待旦，德化宣流。越裳徕贡，嘉禾贯桑。六年制礼，以导天下，著《尔雅》一篇以释其意义。传于后嗣，历载五百，坟典散落，惟《尔雅》恒存。《礼三朝记》：“哀公曰：‘寡人欲学小辨以观于政，其可乎？’孔子曰：‘《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辩言矣。’”《春秋元命包》言“子夏问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为始何？”是以知周公所造也。率斯以降，超绝六国，越逾秦楚，爰暨帝刘，鲁人叔孙通撰置《礼记》，文不

违古。今俗所传三篇《尔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孙通所补，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说，先师口传，既无正谥。圣人所言，是故疑不能明也。夫《尔雅》之为书也，文约而义固，其陈道也，精研而无误。真七经之检度，学问之阶路，儒林之楷素也。若其包罗天地，纲纪人事，权揆制度，发百家之训诂，未能悉备也。臣揖体质蒙蔽，学浅词顽，言无足取。窃以所识，择撝群艺。文同义异，音转失读，八方殊语，庶物易名，不在《尔雅》者，详录品核，以著于篇，凡万八千一百五十文，分为上中下，以须方徠后哲、洪秀伟彦之伦，扣其两端，撝其过谬，令得用谓，亦所企想也。

从张揖上表中不难看出，所谓《广雅》即是对《尔雅》的增广，重点在于“不在《尔雅》者”。

那么，我们拿《尔雅·释诂》“咍咍、皇皇、藐藐、穆穆、休、嘉、珍、祗、懿、铄，美也”与《广雅·释诂》“腴、媼、酖、裂、臙、臘、臘、臘、醢、皇、翼、滑、党、贲、肤、烹、琇、甘、珍、旨、甜、蒸、将、英、皀、娥、媛、艳、玕、沃，美也”对比一下，就发现很大不同。又如《尔雅·释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而《广雅·释诂》作：“古、昔、先、创、方、作、造、朔、萌、芽、本、根、孽、蛙、萃、昌、孟、鼻、业，始也。”《广雅》所载，悉为《尔雅》所无。《广雅》中名物训释之篇尤多《尔雅》所未载者，所以王念孙《广雅疏证序》云：

凡《尔雅》所不载，悉著于篇，其自《易》、《书》、《诗》、《三礼》、《三传》经师之训，《论语》、《孟子》、《鸿烈》、《法言》之注，《楚辞》、汉赋之解，谶纬之记，《仓颉》、《训纂》、《滂喜》、《方言》、《说文》之说，靡不兼载。盖周秦两汉古义之存者，可据以证其得失，其散逸不传者，可藉以窥其端绪，则其书之

为功于诂训也大矣。

其以为有功于周秦两汉之“古义”，其实汉魏之新解尤多，其名物训释则多汉魏以来之制，尤与古义无涉。但是后世人所贵为“音义”之学，尤其是《汉书》。《颜氏家训·勉学》云：“至见服虔、张揖音义则贵之，得《通俗》、《广雅》而不屑。”则其命运亦可悲矣。

此外，张揖还撰有《三仓训诂》三卷，见于《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志上》。

二 其他字书

《七录》著录有无名氏《黄初篇》一卷、项骏《始学篇》十二卷。谢启昆《小学考》卷十三谓《黄初篇》云：“篇首有‘黄初’句，作者当在魏时。”此外《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著录《杂字解诂》四卷，魏掖庭右丞周氏撰。《隋志》还著录有《解文字》七卷，周成撰。梁有，后亡佚。钱大昕云：据《隋志》，“似周氏与周成非即一人。《唐书·艺文志》有周成《解文字》七卷，而无周氏书。且两《志》所载周成书，俱无‘杂字’之名，未知即此书否。掖庭左右丞，汉制皆宦者为之，魏承汉制，则周氏亦必宦者，如注《尔雅》之李巡，亦中黄门也”^①。吴承仕《经籍旧音序录》云：“群书所引其称‘杂字’、‘难字’、‘杂字解诂’者，大抵系之周成，是以周成即周氏矣。”^②而项骏，《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著录为“吴郎中项峻”^③，《三国志》卷五十三《吴书·薛莹传》云：“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始撰《吴书》，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纪录。”事实上，项峻只是字指学家，史才非其所长。此外吴国字指学

①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周成〈杂字〉》。

② 吴承仕：《经籍旧音序录》，中华书局，1986年，第33页。

③ 《册府元龟》卷六百八《学校部·小学》作：“吴项峻为郎中令，撰《始学篇》十二卷。”

家还应提及皇象。《三国志》卷六十三《吴书·赵达传》注引《吴录》云：“皇象字休明，广陵江都人。幼工书。时有张子并、陈梁甫能书。甫恨邇，并恨峻，象斟酌其间，甚得其妙，中国善书者不能及也。”而皇象书《急就章》本今尚存，对后世草书影响极大。

三国时期值得一提的是韦昭的《辩〈释名〉》一卷。《三国志》卷六十五《吴书·韦曜传》云：“又见刘熙所作《释名》，信多佳者，然物类众多，难得详究，故时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误。因自忘至微，又作《官职训》及《辩释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此书今不传，仅有一条佚文见于《经典释文》。《释名》云：“古者车音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日车音尺遮反，舍也。”韦昭云：“车古皆音尸奢反。后汉以来始有居音。”事实上车古音为鱼部字，此条刘熙不误而韦昭适谬。

魏曹彦撰有《字义训音》六卷。曹彦见于《三国志》卷九《魏书·曹真传》：“其悉封真五子羲、训、则、彦、皓皆为列侯。”故《七录》称为“曹侯彦”也。此外曹彦尚有《古今字苑》一卷，亦见于《七录》。

三 孙炎与反切

至于三国时期的音义之书，我们已别于本书史学部分以及经学部分有所论述，这里不多重复。这里我们想谈一谈反切的产生与孙炎的关系。过去人们多引用《颜氏家训·音辞》所云：“孙叔然(炎)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高贵乡公不解反语，以为怪异。”故过去曾认为孙炎始创反切。那么是否真是如此呢？《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云：“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与八体六文之义殊别。”但了解十四音原理的，始于谢灵运。慧皎《高僧传》卷七《慧叡传》云：“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

所达解。乃谿叟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不光如此,谢灵运还对五十音有所了解。日僧安然《悉曇藏》卷五引谢灵运说云:“《大涅槃经》中有五十字以为一切字本。牵彼就此,反语成字。”其实十四音为梵文的元音系统。只有元音系统而无辅音系统传入是构不成拼音的。反切的起源如与梵学传入有关,一定需要五十音系统一并传入。饶宗颐在《鸠摩罗什〈通韵〉笺》一文中据《悉曇藏》二卷注“先在安公《注经录》,或是晚集所得”云:“是为晋时道安所集书,时已有‘悉曇’一类之著述。道安卒于太元十年(苻坚建元二十一年,此为《高僧传》说)。道安以太元四年至长安,注意译事,其译胡为汉,得竺法念之力为多。西域沙门昙摩侍之翻《十诵戒》,亦竺法念为传语。如是悉曇书之传入,已早在什公、大谢之前矣。”^①太元十年为公元385年,晋人南渡已近七十年了。

其实诸家考证悉曇学入华无过东晋者,而孙炎为后汉末三国时人,此时悉曇学是否入华颇可怀疑。如果认为反切之创得益于梵文拼音学理的传入,那么这种看法很显然认为这是一种文化传播关系。但是现在研究比较文化的学者早已明白:如果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文化上的传播关系,那么即使其相似点再多,也只宜作平行研究,而不宜作影响研究。文化传播论现在已经在越来越多的证据面前节节败退了。人们动辄认为中国文化来源于印度,却从来也不考虑二者的异同。反切也不例外,虽然反切也是利用辅音与元音相拼的原理,但人们却从来不顾及反切从来就没有产生一套完整的元音系统与辅音系统这一事实。其实直到本世纪初(1913年)的“注音字母”,真正与梵文相近的现代意义上的字母系统才产生,而这时反切即使从孙炎开始算起也已经产生一千六百多年了。

^① 饶宗颐:《梵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26页。《悉曇藏》二卷见《大正藏》卷五十五,第18页。

尽管反切也是利用拼音原理,但我们反对仅据此就断定反切始于印度文化的传入。没有确凿的传播途径和传播关系,我们宁可相信反切也是独立起源和发展的。印度文献的最大缺点是没有确凿的时间关系,也就是说印度文献是一个动点,而中国文献则大致时代明确,可作为定点。动点本身位置待定,又怎可与定点比较相互之间的早晚和影响关系呢?这种方法不科学之至。

当然我们并非反对反切没有受到任何梵文拼音原理的影响,只是认为现有的证据猜测多于实证,不足以证明反切源于梵文拼音原理。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只好再重新考虑反切的起源了。

很多学者早已指出,反切与双声、叠韵有关,双声、叠韵的起源极早,在《诗经》时代就有极为丰富的双声、叠韵现象。但是注音由读若、直音到反切,是一个极大的飞跃。虽然古人对于声母和韵母都有语言天然上的敏感,但是二字相拼合为一音仍然需要某种程度的自觉。这样说来,反切的根源其实应该追溯到急读、缓读。古人已有此看法。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五《艺文二》云:“切韵之学,本出于西域。汉人训字,止曰‘读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语已有二声合为一字者,如‘不可’为‘叵’,‘何不’为‘盍’,‘如是’为‘尔’,‘而已’为‘耳’,‘之乎’为‘诸’之类,似西域二合之音,盖切字之原也。”郑樵《通志》卷三十五《六书五·论急慢声谱》亦云:“急慢声谱者,慢声为二,急声为一也。梵书谓二合声是矣。……慢声为‘者焉’,急声为‘旃’;‘旃’为‘者焉’之应。慢声为‘者与’,急声为‘诸’;‘诸’为‘者与’之应。”这种缓读为两字、急读为一声的例子在古汉语中屡见不鲜,顾炎武《音论下·反切之始》中早已注意及之。这种急读在原理上与反切是相似的。

众所周知,“反切”最早称为“反语”,所谓孙炎“始创反语”,即是指孙炎发明了反切原理。但“反切”为何名之为“反

语”？这是因为民间有一种语言游戏，“颠倒音辞，用资谈谑”^①。我们试举例说明什么是“反语”。黄侃、黄焯《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云：“反语出于双声叠韵，随拈两字，皆可成音。《世说新语·言语》‘鬼子敢尔’注：鬼子名温休，温休者，温休为幽，休温为婚。此反语起于东汉中叶之证。又《三国志·诸葛亮传》途人为之谣曰：‘如何相求常子阁？’反常阁为石，阁常为岗，可见三国时反语已通行。”^②按：黄侃文字引述有误。“鬼子敢尔”，见于《世说新语·方正》“卢志于坐问陆士衡”条注引《孔氏志怪》言东汉卢充事，云：“父曰‘春煖温也，愿休强也。’即字温休，‘温休’盖幽婚也。”^③余嘉锡按云：

余谓此乃齐东野人之语，非实录也。无论其事怪诞不经，且范阳卢氏皆只以植为祖，不闻有所谓卢充者。……今孔氏《志怪》独云植为卢充之孙，而崔氏女所生之子即植之父，竟不能举其名。所谓温休者，乃崔氏女之小字，非植父也。六朝人最重谱学，若植父果为时令器，仕历数郡二千石，乌有不知其名字者乎？盖卢氏在汉本自寒微，至植始大。故其子孙虽冠盖相承，为时著姓，亦不能退数先代之典矣。流俗相传，乃有幽婚之说，并为植祖杜撰名字，疑是魏、晋之间有不快于卢氏者之所为。干宝、孔约喜其新异，从而笔之于书。孝标因《世说》有“鬼子敢尔”一语，遂引《志怪》之说以实之。不知《世说》此条，采自郭澄之所撰《郭子》。《御览》三百八十八引《郭子》并无“鬼子敢尔”一句。唐修《晋书·陆机传》亦无此语，可以为证。此殆刘义庆

① 吴承仕：《经籍旧音序录》，第7页。

② 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04页。

③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方正》，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300页。

著书时之所加。^①

此考证甚核。故“鬼子敢尔”注引“温休盖幽婚也”之说不能肯定为东汉中叶之产物。而《三国志》卷六十四《吴书·诸葛恪传》云：“先是童谣曰：‘诸葛恪，芦苇单衣箴钩落。于何相求成子阁。’成子阁者，反语石子岗也。建业南有长陵，名曰石子岗，葬者依焉。钩落者，校饰革带，世谓之钩络带。恪果以苇席裹其身而箴束其腰，投之于此岗。”反语当为“成子阁”，而《晋书》卷二十八《五行志中》作“吁汝恪，何若若，芦苇单衣箴钩络，于何相求常子阁”，此殆方音之异。此条倒可确证为三国时期民间之反语。据《金楼子·杂记》上云：“宋玉戏太宰屡游之谈，后人因此流迁反语至相习。至如太宰之言屡游，鲍照之伐鼓，孝绰步武之谈，韦粲浮柱之说，是中太甚者，不可不避耳。俗士非但文章如此，至言论尤事反语。”^② 据此则南北朝时人以为反语实起于战国时之宋玉。

通过以上诸例，读者不难明白“反语”之得名了。“温休”之谐谑“幽婚”者，乃以“温”之声母相拼“休”之韵母，可得“幽”音；以“休”之声母相拼“温”之韵母，可得“婚”音。至今民间尚有此游戏，为锻炼口齿伶俐、反应机敏而设。“成子阁”之谐“石子岗”亦是如此。“成阁”相切为“石”，“阁成”相切为“岗”，虽与《切韵》不尽吻合，但此适见其方音之古，非后人所能伪造。顾炎武《音论下》云：“南北朝人作反语多是双反，韵家谓之正纽、到（倒）纽。”（《南北朝反语》）此种“反语”魏晋南北朝为例极多，较早者如晋孝武帝作“清暑殿”，识者以为“楚声”。盖“清暑”反为“楚”，“暑清”反为“声”也。

那么这种“反语”起源于何时呢？李荣在研究《汉书》卷

①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301—302页。

② 萧绎：《金楼子·杂记》，《丛书集成初编》本。而《颜氏家训·文章》云：“世人或有文章引《诗》‘伐鼓渊渊’者，宋玉已有屡游之消。”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据李慈铭说“宋玉”当改为“《宋书》”，亦殊无据。